

## 從外國文學思潮傳播看五四啟蒙主義文學思潮

梁冬華

**提 要：**五四文學隨外國文學思潮的傳播而發生、發展，並結合本國實際改造外國寫實主義，從而形成啟蒙主義文學思潮。就整體精神氣質而言，五四文學擔負着追求現代性的啟蒙使命，張揚了科學、民主的啟蒙理性精神。就具體作品而言，五四文學體現了批判封建制度、追求個人自由、反映平民生活的啟蒙主題。

**關鍵詞：**五四文學；文學思潮；啟蒙主義

五四文學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端。如何從文學思潮的角度界定五四文學的性質，不僅是所有現代文學研究者首要解決的學術起點，而且還直接體現了研究者的文學史觀，成為諸多史家着力最重也最富爭議的學術難題。自十九世紀40年代以來，國內研究者多受蘇聯文藝觀的影響，把五四文學界定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或者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結合，這些認定因濃重的意識形態意味而偏離了文學的真實存在，遭受了越來越多的質疑。近年來，國內學界開始解除意識形態的禁錮，返回歷史現場重新界定五四文學思潮的性質，並收穫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其中，學者楊春時關於現代性和文學思潮的研究無疑是其中最富於探索意義和學術價值的成果，他用現代性理論界定了五四文學的啟蒙主義文學思潮性質<sup>①</sup>。文本延續了楊先生關於五四啟蒙主義文學思潮的認定，選取外國文學思潮傳播的視角看五四文學的發生、發展，從而梳理出五四文學對外國寫實主義接受、學習並將之本土化改造成啟蒙主

<sup>①</sup> 楊春時，〈現實主義、浪漫主義還是啟蒙主義——現代性視野中的五四文學〉，《廈門大學學報》5（2003）。

義文學思潮的歷程，揭示了五四文學屬於啟蒙主義文學思潮的原因。

## 一、外國文學思潮與五四文學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在西方堅船利炮攻勢之下被迫打開國門，引進西學改造貧弱國體，開啟了從器物到制度再到觀念的“西學東漸”之路，以達到救亡圖存、強國立邦的目的。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外國文學思潮也被一些有識之士引進中國內地文壇，開始了以更新國內文學觀念、促進新文學發展為目的的傳播之路。

外國文學思潮的傳播，對中國內地文學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尤其與五四文學的發生、發展有着密切的聯繫（根據學界慣例，本文的“五四文學”指從1917年文學革命至1928年革命文學興起這一時期的新文學，也即中國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十年的文學）。

首先，國外文學思潮的傳播引發了五四文學革命。中國內地文壇首次以思潮史的線索完整傳播歐洲文藝發展史的是1915年陳獨秀的《現代歐洲文藝史譚》<sup>②</sup>。《史譚》概略性地介紹了歐洲文藝思想從古典主義到理想主義再到寫實主義、自然主義的變遷線索，從社會變革層面揭示了文學變遷的原因，並着重介紹了自然主義文學思潮及左喇（左拉）等作家。此文不僅打開了內地文壇的譯介之門，開啟外國文學思潮傳播之路；而且將社會、科學變革與文學思潮變遷密切聯繫起來，體現了社會進化史觀，成為五四文學革命的先聲。經過兩年多的醞釀期，胡適於1917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延續了《史譚》的進化史觀，認為“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吾輩以歷史進化之眼光觀之，決不可謂古人文學皆勝於今人也”<sup>③</sup>，遂提出針對古文的文學改良八項主張。陳獨秀隨即發表《文學革命論》，高舉文學革命軍三大主義，即“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

<sup>②</sup> 陳獨秀，〈現代歐洲文藝史譚〉，《青年雜誌》3（1915）。

<sup>③</sup>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5（1917）。

的社會文學”<sup>④</sup>。《文學革命論》宣告文學革命發生，拉開了五四文學序幕。

其次，外國文學思潮的傳播打開了五四新文學建設的世界視野。從《現代歐洲文藝史譚》到文學革命再到革命文學興起的短短十多年時間，內地文壇大規模傳播各種外國文學思潮。<sup>⑤</sup>一是古典主義文學思潮，如《何謂古典主義？》（鄭振鐸著，1923年）等；二是浪漫主義文學思潮，如《英國浪漫派三詩人拜倫，雪萊，箕茨》（徐祖正著，1923年）、《法國的浪漫主義》（G. L. Strachey 著，希孟譯，1924年）等；三是寫實、自然主義文學思潮，如《易蔔生主義》（胡適著，1918年）、《近世文學上的寫實主義》（愈之著，1920年）、《實驗小說論》（左拉著，修勺譯，1927年）等；四是名目眾多的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如評介意象派的《法國詩之象徵主義與自由詩》（劉延陵著，1922年）等，評介唯美主義作家的《王爾德傳》（沈澤民著，1921年），評介其他派別的《未來派文學之現勢》（沈雁冰著，1922年）、《人類學派神話起源的解釋》（玄珠著，1928年）等。這些譯介文章或是國外文論家評介文章的翻譯、或是內地學者撰寫的介紹性論文，涉及多種外國文學思潮，幾乎匯集了自文藝復興古典主義以來的各種思潮，是外國幾百年來優秀文學成果的凝聚。西方文學思潮的傳播，打開了長期閉關自守的國人視野，使其得以共用人類文學財富，從而為長期停滯不前的內地文壇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為五四新文學建設提供了多元的流派方向。

再次，外國寫實主義成為五四新文學建設的方向。多元的外國文學思潮流派為五四新文學建設提供了多元的建設方向。如何選擇、選擇哪一種流派方向，這一系列問題不僅關涉新文學建設的目的，還影響新文學建設的效果，成為新文學建設初始的關鍵選擇。但顯然，集革命家、譯介家、新文學宣導者等多重身份於一身的陳獨秀，早已根據內地政治時局和文學現狀作出了審慎的選擇，以重點推介寫實主義的方式指明了新文學建設的方向。陳獨秀在1915年的《現代歐洲文藝史譚》中花費了較大篇幅評介寫實、自然主

<sup>④</sup>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新青年》6（1917）。

<sup>⑤</sup> 本段所用文獻篇目皆見《中外文學關係史資料彙編（1898—1937）》一書。該書由賈植芳、陳思和主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

義。雖然文章的題目為“文藝史譚”，但從全文篇幅來看，論述自然主義及其作家的部分遠遠大於論述文藝發展史的部分。甚至在文藝發展史部分，寫實、自然二派的篇幅也是諸派別中最重的。陳獨秀對寫實、自然主義的器重，與其社會學進化史觀有密切的聯繫。他在解釋寫實、自然主義發生時說：“十九世紀之末，科學大興，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謂赤裸時代，所謂揭開假面時代，宣傳歐士自古相傳之舊道德、舊思想、舊制度。一切破壞。文學藝術亦順此潮流由理想主義再變而為寫實主義（Realism），更進而為自然主義（Naturalism）。”<sup>⑥</sup>在他看來，十九世紀末科學的發展引發了外國劇烈的時代變革，寫實主義便是此變革的產物，表徵着破壞一切“自古相傳之舊道德、舊思想、舊制度”的精神，這恰恰是改變內地迂腐醜陋現狀所需要的變革動力。因此，陳獨秀繼《敬告青年》提倡“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sup>⑦</sup>之後，以引進寫實主義文學的方式繼續推進人們變革愚昧舊時代的決心，使文學成為與科學、民主並駕齊驅的革命利器、啟蒙工具。1917年，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高調宣揚建設國民文學、寫實文學和社會文學，再次表明了對寫實主義的重視及以寫實主義引領文學革命的雄心。在陳獨秀等人的大力宣導下，五四文學革命爆發，人們以破舊立新的無畏勇氣全面推倒舊文學，建設寫實主義新文學。

可見，外國文學思潮的輸入不僅成為五四文學革命爆發的重要原因，而且打開了新文學的世界視野、提供了多元的文學派別；同時，寫實主義還經過內地文壇選擇性地重點推介而成為五四新文學建設的方向。因此，隨着外國文學思潮的輸入、推廣、普及的傳播過程，五四文學也走過了醞釀、興起、發展的成長過程。

## 二、外國寫實主義的本土轉化：具有寫實傾向的“人的文學”

《文學革命論》宣告文學革命後，文壇開始沿着其所指引的寫實主義方

<sup>⑥</sup> 陳獨秀，〈現代歐洲文藝史譚〉，《青年雜誌》3（1915）。

<sup>⑦</sup> 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誌》1（1915）。

向發展，全面建設新文學。在新文學建設中，中國文壇首要解決的是如何將外來、輸入性的寫實主義融入本國文學發展實際的難題。為此，建設者作了多方面的努力。

一是在理論層面，將寫實主義轉化成本土化的“人的文學”主張。

《文學革命論》作為宣揚革命的戰鬥檄文，其重心在於痛陳“今日中國之文學，萎縮陳腐”的現狀，以促成國人的文學革命；而較少論及建設新文學的措施和步驟，僅簡要提出了建設國民文學、寫實文學和社會文學的方向。繼續從理論層面建設寫實主義並成功實現本土轉化的，是周作人和其“人的文學”主張。他在1918年底發表《人的文學》<sup>⑧</sup>，開篇即表明“現在應該提倡的新文學，簡單的說一句，是‘人的文學’”；接着，他詳細解釋“人的文學”涵義，即“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最後，他以外國作家如易卜生、托爾斯泰、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補充說明了“人的文學，當以人的道德為本”的宗旨。可見，“人的文學”實際源於以托爾斯泰為代表的人道主義作家作品，經周作人結合中國實際整合、改造後形成“人道主義＋研究人生問題”的內容涵義。其中，“人道主義”表明了作家的創作態度，而“研究人生問題”則具體指明了文學的寫作物件。“人的文學”主張，不僅使《文學革命論》提出的寫實主義方向有了更具實質性的內容，而且也使寫實主義得以在中國落地生根完成本土轉化。此後，周作人接連發表《平民的文學》、《貴族的與平民的》等文章，一再堅持平民的文學“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學”<sup>⑨</sup>，重申“人的文學”立場。經過周作人的改造及反復強調，外來的寫實主義轉化成了頗具本土特色的“人的文學”，更具親和力也更切合中國文學現狀。因此，“人的文學”所包含的“人道主義＋研究人生問題”涵義廣為新文學建設者理解、接受，成為這一時期文學創作的理論指導，並產生了大量以此為題材的新文學作品。

二是在創作方法層面，將外國文學寫實技法運用到中國文學創作。

早期的新文學建設者，遵從文學革命破舊立新的口號，揚棄傳統文學，

<sup>⑧</sup> 周作人，〈人的文學〉，《新青年》6（1918）。

<sup>⑨</sup> 仲密（周作人），〈平民的文學〉，《每週評論》5（1919）。

以外國文學為師創作新文學。魯迅的《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是最早“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sup>⑩</sup>的新文學作品。這些作品在主題、表現形式上都較以往的古典文學有了巨大的差異，顯然是作者自覺學習外國文學技法的結果。魯迅對此也供認不諱，坦言自己的《狂人日記》受了俄國作家果戈理發表於1834年的同名小說《狂人日記》和尼采超人思想的影響，而“《藥》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萊夫(L. Andreev)式的陰冷”<sup>⑪</sup>。如魯迅般具有留洋背景、直接接觸外國文學潮流的成熟作家畢竟是少數，新文學的建設還需提高普及面、吸引更多人的參與才能取得實質性的成效。因此，外國寫實主義文學作品的譯介和技法的學習成為新文學建設的關鍵步驟。

外國寫實文學作品的譯介工作，在文學革命發生後不久就開始了。《新青年》在1918年6月發行的第4卷第6號推出“易蔔生號”，刊載了易的劇本《娜拉》、《國民之敵》以及胡適的評介文章《易蔔生主義》。1920年起，沈雁冰和《小說月報》接過了推廣寫實文學的接力棒。首先，沈雁冰利用接編《小說月報》的機會重點刊發外國寫實派小說。沈先於1920年1月接編《小說月報》的“小說新潮”欄目，當即發表欄目宣言“中國現在要介紹新派小說，應該先從寫實派自然派介紹起。本欄的宗旨也就在此”<sup>⑫</sup>，並進一步說明“現在中國研究文學的人，都先想從介紹入手，取西洋寫實自然的往規，做個榜樣，然後自己着手創造”<sup>⑬</sup>。由此可見其以外國寫實自然派文學為師、逐步發展本國新文學創作的建設策略。1921年1月，沈全面接編《小說月報》，以“譯述西洋名家小說而外，兼介紹世界文學界潮流之趨向，討論中國文學革進之方法”<sup>⑭</sup>為宗旨，不遺餘力推介外國寫實、自然派作品以革新中國內地文學技法。這些譯介作品的傳播，拉近了中國文壇與世界文壇的距離，使中國文壇得以近距離地接觸、學習國外優秀的寫實、自然派作品，既利於提高作家創作技巧，也利於培養讀者閱讀此類文學的興趣。其次，沈雁

⑩ 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 小說二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1，1-2，2，6。

⑪ 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 小說二集·導言》，1，1-2，2，6。

⑫ 記者（沈雁冰），〈“小說新潮”欄宣言〉，《小說月報》1（1920）。

⑬ 冰（沈雁冰），《答黃厚生〈讀小說新潮欄宣言的感性〉》，《小說月報》4（1920）。

⑭ 〈《小說月報》改革宣言〉，《小說月報》1（1921）。

冰還開設專題討論自然主義文學，普及新文學創作方法。沈在《小說月報》開闢“自然主義的論戰”<sup>⑮</sup>專題，以解答讀者疑問的方式論述了寫實、自然派文學的寫實精神、創作要領等內容。例如，讀者史子芬詢問如何着手創作人生問題作品，沈回答說，“第一，要實地地精密觀察現實人生，如其奧秘，第二，用客觀角度去分析描寫”。這一答疑過程更像是《小說月報》為當前文學發展把脈、開藥，其開出來的藥方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和導向性，對文壇產生了廣泛影響，更大範圍地傳播、普及了寫實、自然主義創作方法。

在理論和寫作方法的雙重推動下，中國文壇成功將外國寫實主義本土化，產生了一批標榜為“人的文學”的作品。《中國新文學大系》及時總結了自1917年至1927年的新文學建設成果，編選者在評價各自輯選的作家作品時，都不約而同地圍繞“人生、社會問題”、“人道主義”、“寫實”等關鍵字而展開。比如小說集編選者們強調了文學對時代、社會、人生問題的密切關注：茅盾承認文學研究會的作家作品都有一個“共通的基本的態度”，即“文學應該反映社會的現象，表現並且討論一些有關人生一般的問題”<sup>⑯</sup>；魯迅認為，集中在刊物《新潮》周圍的彌灑、莽原、狂飆等文學團體作家，“他們每作一篇，都是‘有所為’而發，是在用改革社會的器械”<sup>⑰</sup>；鄭伯奇則指出，“若說創造社是藝術至上主義者的一群那更顯得是不對。……郭沫若的詩，郁達夫的小說，成仿吾的批評，以及其他諸人的作品都顯示出他們對於時代和社會的熱烈的關心”<sup>⑱</sup>。戲劇集選家洪深則在新戲反映人生的特點上還突出了寫實性，稱“寫實的，模仿人生的廢除歌唱而全用對話的新戲”<sup>⑲</sup>。散文集選家郁達夫則在文學總體格局中討論散文，概括說：“五四運動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見。……現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徵，是每一個作家的每一篇散文裏所表現的個性，比從前的任何散文都來得強。”<sup>⑳</sup>詩歌集選家朱自清也以類似的口吻總結：“民七以來，

<sup>⑮</sup> 〈通信·自然主義的論戰〉，《小說月報》5（1922）。

<sup>⑯</sup> 茅盾，《中國新文學大系 小說一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4。

<sup>⑰</sup> 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 小說二集·導言》，1，1-2，2，6。

<sup>⑱</sup> 鄭伯奇，《中國新文學大系 小說三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8-9，2。

<sup>⑲</sup> 洪深，《中國新文學大系 戲劇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13。

<sup>⑳</sup> 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 詩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2。

周氏提倡人道主義的文學……這也是時代的聲音，至今還為新詩特色之一。”<sup>①</sup>綜合各選家的評論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在內容上體現了周作人“人的文學”蘊含的“人道主義+研究人生問題”理論主張，在技法上則借鑒了外國的寫實主義創作方法，是一批反映中國20世紀初社會、時代風貌的寫實作品，也是中國完成外國寫實主義本土轉化後創作的文學作品。

可以說，從譯介家重點推介寫實主義，到融入本土努力的理論、技法改造，再到“人的文學”形成，新文學建設經歷了“接受外來思潮——本土轉化——自我再創造”的發展道路。經由此發展路徑形成的具有寫實傾向的“人的文學”作品，早已經偏離了傳播之初的外國寫實主義標識，而不可避免地帶上了“中國化”的本土烙印，是新文學建設者在外國寫實主義的影響下結合本國實際創作出來的作品。

### 三、“人的文學”屬於啟蒙主義文學思潮

五四時期具有寫實傾向的“人的文學”，是中國文壇自覺學習外國寫實主義並經本土化改造後創作出來的作品。那麼，該如何從文學思潮的角度認定這些作品的性質呢？能否從其師法外國寫實主義、具有寫實傾向而簡單地認定為現實主義文學思潮呢？如果不屬於現實主義思潮，又該屬於哪一思潮派別呢？要解決這一系列問題，只能依據文學思潮的確切涵義。

五四文學以前，中國既沒有產生文學史意義的文學思潮派別，也不存在學術研究意義的文學思潮術語。五四以前的古典文學基本維持固定、同一的文學面貌，發展停滯不前，並未產生動態、交替性的文學思潮。夏炎德曾在1933年解釋了其中的原因：“因為歷代政治上只有迴圈的皇朝興替，社會上保守着傳統的封建思想，在文藝上所表現的也只是傳統的文藝，沒有明顯的思潮向前推動。”<sup>②</sup>也就是說，封閉、僵化的封建制度和社會狀況是中國未發生文學思潮的主要原因。直到1915年，中國文壇通過引進的外國文學思潮才得以接觸、瞭解、認識“文學思潮”。隨着外國文學思潮的傳播以及社會、時局的變動，中國以1917年文學革命為起點產生了第一個文學思潮派

<sup>①</sup> 郁達夫，《中國新文學大系 散文二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5。

<sup>②</sup> 夏炎德，《文藝通論》（上海：開明書店，1993），155。

別，即本文所討論的五四時期的文學。

中國最早在學術研究層面使用“思潮”這一術語的是梁啟超。1921年，他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凡文化發展之國，其國民於一時期中，因環境之變遷，與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進路同趨於一方向；於是相與呼應洶湧，如潮然；始焉其勢甚微，幾莫之覺；寢假而漲，而達於滿度，過時焉則落，以漸至於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則其‘思’必有相當之價值；而又適合於其時代之要求者也。”<sup>⑳</sup>從中可看出梁啟超對“思潮”的理解：其一，就外在形態而言，思潮具有發展性，是動態的發展過程，隨“環境之變遷”而漲落、衰熄；其二，就內在精神而言，思潮具有時代性，是時代精神的凝聚，即“思”。此後，孫俚工在1933年出版的《文學概論》中首次將文學思潮的涵義、特質等內容納入文學理論著作框架。在“文學底思潮的界說及功用”章節中，他原文引用了梁啟超的思潮論述，而後提出文學思潮的涵義，即“文學思潮和各種其他思潮（指一時代的思潮，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思想等，筆者注）有十分密切的關係，是有反映社會的意識和其發達的過程的”<sup>㉑</sup>，並以泰納的種族、環境、時代三要素說詳細說明了文學思潮的特質。孫的文學思潮觀與梁啟超思潮觀一脈相承，都突出思潮的社會、時代標識，充份顯示了20、30年代國內以時代、社會風氣看待思想、文學潮流的普遍共識。

中國20、30年代盛行的文學思潮觀，受外國文學思潮傳播而產生，與世界文學研究保持了基本一致的方向。韋勒克、沃倫在流傳甚廣的《文學理論》中說，一個文學時期“是一個以埋藏於歷史過程中並且不能從這過程中移出的規範體系所界定的一個時間上的橫斷面”<sup>㉒</sup>。韋勒克所謂的文學時期實際就是文學思潮運動期，文學思潮的漲落、更新構成了整個文學發展的歷史。韋勒克一方面論述了文學發展的整體性，即每一思潮都置身於文學發展歷史過程之中，是其中“不能移出的規範體系”；另一方面則說明了文學思

⑳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21），1。

㉑ 孫俚工，《文學概論》（上海：廣益書局，1933），22。

㉒ [美]韋勒克、沃倫，《文學概論》，劉象愚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307。

潮的時代性，即每一思潮都是“一個時間上的橫斷面”，標誌着某一歷史時期的特徵。可見，韋勒克的文學思潮觀除了包含內地20、30年代思潮觀的時代性要求外，還強調了文學思潮史（文學發展史）的整體性。根據整體性和時代性的兩個規定，可將西方文學思潮史視為文學對現代性的反應<sup>⑥</sup>。首先，現代性貫穿西方文學自文藝復興以來的發展始終，總括了西方文學整體格局。西方社會自文藝復興便開始了現代化進程，與社會層面的現代化進程相對應的是精神層面的現代性體驗。福柯將現代性理解為“一種態度”：“態度是指對於現時性的一種關係方式：一些人所作的自願選擇，一種思考和感覺的方式，一種行動、行為的方式。它既標誌着屬性也表現為一種使命，當然，它也有一點像希臘人叫作 *ethos*（氣質）的東西。”<sup>⑦</sup>顯然，現代性是一種與現代社會歷史變遷相匹配的精神氣質，是文學發展的內在動因，推動文學思潮的變更、革新。其次，對現代性的不同反應構成了迥異的文學思潮表徵，形成了各種文學思潮派別。其一，以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為重任的新古典主義文學思潮，強調秩序、規範、理性、國家意志，以文學的想像完成民族國家共同體的建造。其二，爭取現代性的啟蒙主義文學思潮，提倡科學、民主，以啟蒙理性解除愚昧、落後。其三，反抗、批判現代性的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文學思潮，浪漫主義以回歸自然、逃避城市文明的方式批判現代工業社會，現實主義以真實描寫的方式直擊資本主義制度和人際關係的黑暗，現代主義則以荒誕、變異、畸形的方式痛訴非理性的現代生活。

根據現代性理論和文學思潮派別的不同精神內涵，我們可以辨析五四文學屬於啟蒙主義文學思潮：

首先，五四時期正值中國從傳統封建社會向現代轉型的啟蒙時期，五四文學擔負着追求現代性的啟蒙使命。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值國人引進西學以西方現代化模式救國家於危難之中的特殊歷史時期。置身於此時代背景中

<sup>⑥</sup> 關於現代性與文學思潮關係的問題，可參閱楊春時的相關論述，具體可見其論著《現代性與中國文學思潮》（北京：三聯書店，2009）。

<sup>⑦</sup> [法] 蜜雪兒·福柯，〈何為啟蒙〉，收在汪民安等編《現代性基本讀本》（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652。

的五四文學自覺承擔起了思想、文化啟蒙的歷史使命，擺脫封建愚昧、爭取現代性。五四文學的發生，其導火索始於外國文學思潮的傳播，但深層的原因卻是出於開啟民智、改良國民性的啟蒙目的。出於對腐舊傳統古文及與之相連的國民劣根性的痛恨，胡適、陳獨秀等人連袂發動了文學革命，摧毀舊文學建設新文學，進而達到思想啟蒙的目的。周作人坦言“荒謬的思想與晦澀的古文，幾乎已融合為一，不能分離”，“在文學革命中，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革命是第二步，卻比第一步更為重要”<sup>⑳</sup>。這些言論切實道出了處於轉型時期的五四文學所擔任的啟蒙重任。

其次，五四時期的文學張揚了科學、民主的啟蒙理性精神。啟蒙主義文學思潮產生於18世紀的歐洲，恰逢科學、民主大昌其道的時代。科學的發達助長了人類的無限信心，堅信社會的線性進步，推翻陳腐勢力以迎接新社會的到來，宣導民主、自由、平等，主體意識膨脹，處處洋溢着樂觀的理性精神。相同的，五四時期的文學也有着對科學的熱情和對民主的渴望。五四學人極為推崇科學，不僅直接讚美科學技術的巨大能量，如郭沫若將表徵先進科學技術的輪船讚揚為“二十世紀的名花！近代文明的嚴母呀！”（《筆立山頭展望》）；而且還將科學及“科學主義”推廣到每一思想文化領域，形成一個“科學主義文化語境”，即“科學泛化、上升為一種形而上的價值信念與原則導向，具有從認識論向價值論轉化的意義，泛化為意識形態的立場”<sup>㉑</sup>。從科玄論戰對科學主義的堅持、文學創作的寫實技法對科學實證主義的借鑒等等，處處體現着科學主義文化語境的存在。而對民主的渴望則是五四啟蒙精神的又一表現。由於經歷了民主政治制度改革失敗，五四文學的民主渴求從政治層面轉向了個人層面，宣揚自由、平等、博愛，喚起“人”的覺醒。關注社會、人生的問題小說、戲劇盛行，探討社會、時代弊病，抨擊封建勢力對個人的壓迫，鼓勵人們解放個性、追逐自我的幸福。就連抒情性的散文和詩歌，也張揚着強烈的個人意識。

就具體作品而言，五四時期的“人的文學”作品如實反映時代現狀，體現了批判封建制度、追求個人自由、反映平民生活的啟蒙主題：其一，批判

⑳ 仲密（周作人），〈思想革命〉，《新青年》4（1919）。

㉑ 俞兆平，《現代性與五四文學思潮》（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15。

封建制度是啟蒙文學的首要目標。啟蒙文學產生於新舊社會交替的巨變時代，清除陳舊封建社會以迎接進步新社會的到來，成為啟蒙文學的首要任務。在18世紀的歐洲，“為了揭露批判封建專制政權和天主教會的腐朽、反動，宣傳資產階級的政治理想，啟蒙主義文學思潮應運而生”<sup>⑩</sup>。同樣在中國的五四時期，“人的文學”作品緊跟時代號角，真實揭露封建制度的殘暴以鼓勵人們與之鬥爭、決裂的決心，響應了啟蒙文學的批判封建主題。“人的文學”作品暴露了封建制度、禮教的黑暗。魯迅創作了中國首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批判的矛頭直指披着“仁義道德”外衣的封建禮教。他借主人公之口驚駭地道出了封建禮教吃人、毀人的真相。如果說魯迅在《狂人日記》中對封建制度、禮教的批判還帶有象徵的寓意，那麼《祝福》則通過祥林嫂從肉體到精神的毀滅正面揭示了封建禮教殘害，加重了批判的砝碼。其他的作家作品也貫穿着批判封建制度的主題，如許傑《慘霧》通過兩個村莊為爭奪一塊地而爆發械鬥的故事揭示了封建制度對底層農民的壓迫、摧殘；張資平的小說《梅嶺之春》也以童養媳和遠房堂叔相戀的悲劇控訴了封建倫理觀念對自由婚戀的迫害。

其二，追求個體自由是啟蒙文學的核心精神。啟蒙思想家、文學家盧梭曾以“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sup>⑪</sup>的言論轟動歐洲大陸，引導人們衝破現實的重重枷鎖、束縛，回歸自由的本性。個體的自由成為啟蒙運動最核心的內在精神。“人的文學”在批判封建制度的同時也表達了對自由的嚮往。在胡適的戲劇《終身大事》中，田家小姐勇敢掙脫父母迂腐封建婚姻觀的束縛，遵從內心呼喚，留下了“這是孩兒的終身大事，孩兒應該自己決斷”的字條，邁出家門尋求幸福和自由。周作人的散文詩《小河》則通過擬人化的描寫，講述了河水被圍困在堰裏的苦惱，“便只是想流動，想同從前一般，穩穩的向前流動”，表達了人們打破封建桎梏、追求個體自由的渴望。啟蒙文學家除了在內容層面表達個體自由的追求，還在體裁層面以書信、日記體的方式自由抒發個體的心聲，突破了傳統封建制度對個人的壓

<sup>⑩</sup> 上海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歐洲近代文學思潮簡編》（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6。

<sup>⑪</sup> [法]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8。

抑，張揚了個體意識、精神的自由。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馮沅君的《隔絕》、廬隱的《海濱故人》等都是其中的優秀作品。

其三，反映平民生活是啟蒙文學的基本內容。追求個體自由的啟蒙精神打破了封建制度的壁壘，也消除了人與人之間的等級差距，自由、平等、博愛成為啟蒙時代的美好理想。在這一理想的照耀下，“人的文學”揚棄了傳統文學的貴族氣息、內容，轉而將目光從貴族投向了平民階層，關注普通百姓生活。一是以人道主義博愛關懷底層勞動人民，揭示其被侮辱被損害的命運。沈尹默、胡適、陳綿三人同以《人力車夫》為題，選取不同角度、文體講述了人力車夫的窮困生活和不公遭遇，從而折射出廣大底層民眾的悲慘命運。二是以自然主義態度描寫平民知識分子，反映其在特定歷史時期中的思想、生存狀況。由於身處國難當頭的特殊歷史語境，五四知識分子大多承擔着雙重重壓：一方面要承擔國家救亡圖存的使命，即作為知識分子對廣大未覺醒民眾的啟蒙，另一方面還要解決個人問題，即作為社會個體在動亂年代遭受的心靈創傷和生活苦惱。焦慮、徘徊、憂憤、孤獨、悲涼，成為這一時期知識分子共同的素描像。在魯迅的小說作品中，常常隱含着一個“覺醒起來的智識青年”<sup>②</sup>內在視角。這一視角或藏匿於第三人稱敘述的字裏行間、或化身為第一人稱直接現身，如在《阿Q正傳》中對國民劣根性的鞭撻、在《狂人日記》和《祝福》中對封建禮教的批判、在《藥》和《故鄉》中對愚昧民眾的同情等，充份體現了五四知識分子強烈的“感時憂國精神”（夏志清語）。而郁達夫的《沉淪》卻展現了另一知識分子群體——留洋學生的雙重創傷：個體的身心痛苦與國家的苦難的交織。總的來說，五四時期“人的文學”作品表現了啟蒙文學主題，屬於啟蒙主義文學思潮。

關於五四文學啟蒙主義性質的認定，其實早在五四文學創作、建設過程中就已成爲文壇的共識。五四文學大將魯迅以自己的創作一語道破了五四文學的啟蒙主義性質：“說到‘爲甚麼’作小說罷，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爲必須是‘爲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sup>③</sup>鄭伯奇則分別

<sup>②</sup> 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 小說二集·導言》，1，1-2，2，6。

<sup>③</sup> 魯迅，《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收魯迅《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152。

從來源（法國啟蒙文學）和精神（科學、民主）兩方面肯定了五四文學的啟蒙主義性質，他說：“新青年諸君子所提倡的，和十八世紀法國的啟蒙文學，英國的湖畔詩人所抱的思想並沒有大的差異：我們歡迎賽先生和德先生，我們要用自己講的話來寫自己的文學。”<sup>④</sup>此外，朱自清在梳理五四詩歌史時，也稱這一詩歌史顯示了“啟蒙期詩人努力的痕跡”，即“他們怎樣從舊鑛鎊裏解放出來，怎樣學習新語言，怎樣尋找新世界”。連續的三個“怎樣”，點明了五四詩歌的多層“啟蒙”含義：一是文字的啟蒙，從古文變革為白話文，即“新語言”；二是思想的啟蒙，脫離古文表徵的封建舊社會，迎接和學習新語言、新思想，“尋找新世界”。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學界長期忽略甚至否定了五四啟蒙主義文學思潮的存在，出於意識形態的目的曲解“文學思潮”涵義，從而誤讀了五四文學思潮的性質。比如，丁易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將其界定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萌芽，體現了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以政治論說代替文學史敘述，遮蔽了文學的真實存在；而張畢來的《新文學史綱》（作家出版社1955年）、唐弢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則界定為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結合，將文學思潮簡單等同為創作方法，忽略了文學思潮的獨特歷史內涵，誤讀了五四文學思潮的身份。這些五四文學思潮性質的認定均因遠離文學的本真面目遭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因此，清除歷史的誤讀和意識形態的障蔽，回到五四現場，從外國文學思潮傳播的視角看五四文學的發生、發展，清理出五四文學對外國寫實主義接受、學習並將之本土化改造成啟蒙主義的歷程，還原真實的五四啟蒙主義文學思潮，也就達到了本文的目的。

（梁冬華 南寧 廣西藝術學院人文學院 / 廈門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

<sup>④</sup> 鄭伯奇，《中國新文學大系 小說三集·導言》，8—9，2。